·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DOI:10. 20004/j. cnki. ujn. 2025. 04. 001

论数智文明的生成逻辑与治理之道

王海东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数智文明以多重技术叠加为支撑,以数据为核心要素,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但也引发了系列危机:新旧观念冲突催生伦理、法律等困境;技术理性冲击导致自我认同、知识体系与认知危机及意义世界坍缩;全球、国家与社会治理层面,遇到数智边疆博弈、安全威胁、算力权利失衡、数智鸿沟等新难题。而这些危机与挑战反向促逼数智文明不断发展与完善,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若要有效治理数智危机则需多维协同共治:在理论上,以过程哲学、交往理性重构认知与价值体系,化解观念、行为与规范上的冲突;在实践上,构建全球多边治理框架、国家动态安全机制及社会多元共治模式,弥合数智鸿沟、遏制技术垄断,妥善治理好社会问题,从而开辟包容、可持续的多元主体和谐共生的文明新境界。

[关键词]数智文明;生成逻辑;治理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4-0005-11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迁,数智文明①应运而生。从智能客服到无人驾驶,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城市,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全方位地重塑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从理论层面看,数智文明的兴起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问题域,丰富了人类对自身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数智文明的发展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如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社会治理效率、促进文化创新等,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隐私保护、算法偏见、数智鸿沟等。因此,如何在充分发挥数智文明优势的同时,有效应对其带来的挑战,实现数智文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数智文明及其特征

数智文明是在数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它主要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支撑,将数字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也是产品与商品之一,通过智能化的手段实现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运行逻辑及结构模式。

可以说,数智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是数字技术与人类文明的迭代升级。从本质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及左翼政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3&ZD328);云南大学人文社科标志性成果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23YNUBZCG04)。

[作者简介]王海东,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邮箱:whaidong005@sina. com。

①徐新建:《人类学与数智文明》,《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5期。

讲,数智文明是对信息文明、数字文明的深化与拓展,它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与史前文明、农耕文明及工业文明不同,数智文明是新兴的文明形态,是移动互联网、元宇宙及数字文明的最新版,既有共性,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在此,呈现其四种特征:

第一是数智主体多元化,多重主体共存。数智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彻底打破了传统文明形态下主体相对单一的格局。在漫长的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从史前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主体始终是人类这一碳基生命形式。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正逐步迈入生命3.0时代——既能更新软件,也能改变硬件,“自己设计硬件和软件”[①]的智能生命诞生。在这一崭新时代语境下,硅基生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硅基生命以芯片、算法为基础,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与计算能力,它们无须像碳基生命一样依赖有机物质与复杂生理系统维持生存[②];“不受空间、时间和设计影响的新宇宙诞生,能自我制造、自我修复、自我治理,不断创生新世界。”[③]如机器人能不知疲倦地执行各类任务,从危险环境作业到高精度科研实验,都能高效完成,展现出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工作效能。其思维模式基于程序设定与数据学习,在特定领域能实现快速决策与精准执行,为文明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碳—硅混合生命形态也初现端倪。通过人—机融合技术,将人类的具身性、自由意志、想象力、创造力与硅基生命的强大算力、存储能力有机结合。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大脑能与外部智能设备直接相连,实现信息快速交互,应用于医疗健康、艺术、体育、军事与游戏等许多领域[④]。未来,人类或许能够借助外置芯片拓展记忆容量、提升计算速度,在保持人类主体意识与情感的基础上,拥有部分硅基生命的强大功能。这种碳—硅混合生命形态,既传承了人类的丰富情感、想象力与创造力,又汲取了硅基生命的高效理性,进一步丰富了数智文明主体的多样性。

在数智文明时代,数字用户、碳基生命、硅基生命以及碳—硅混合生命共同构成多元主体。普通个体这一传统碳基生命形式,借助自媒体平台,能跨越地域与阶层限制,自由分享知识、传播文化,成为文化传播的新主体;小微企业这类由碳基生命主导的经济组织,通过电商平台打破大企业市场垄断,参与全球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崭露头角;而硅基生命形式的智能算法,能精准分析海量数据,为企业决策、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碳—硅混合生命形态则可能在艺术创作领域大放异彩,以独特视角融合人类情感、艺术作品数据库与机器理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作品。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共生,极大激发了社会活力,推动数智文明发展呈现出多维度、全方位的创新态势,彻底改写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版图。

第二是社会的数字化和泛在的智能化,存在境遇变为虚拟界与实在界交互共在。如今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渐被数智设备所记录、存储、表达和传播,数智世界不断生成、绽放,虚拟空间愈来愈多,特色虚拟群落涌现,且与实在界交互共在[⑤],形成新的存在境遇。

从个人的消费行为、社交活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决策,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治理,都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成为数智文明的重要资源,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进行存储、传输和分析,为智能化的决策与服务提供了基础。泛在的智能化则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决策与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智能客服能24小时在线解答用户的问题;智能家居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习惯自动调节室内温度、灯光等;智能穿戴设备能实时监测用

①泰格马克著,汪捷舒译:《生命3.0》,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

②王海东:《建构与规范:数字文明论纲》,《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③王海东:《元宇宙论:新牢笼抑或新世界?》,《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2年第3期。

④肖峰:《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现状、难题与前景》,《人民论坛》,2023年第16期。

⑤王海东:《政治的虚拟与虚拟的政治——虚拟空间政治学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户的健康数据，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在社会治理上，传统的科层治理体系存在着信息传递慢、决策效率低、缺乏灵活性等弊病，难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随着各级政府数智化改造之后，依托于大数据、AI等技术，能够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效率。在组织形态上，形成动态多样的跨越实在界与虚拟界的多种组织形态，虚实交互，既提高行政效率，更能有效为民服务。

第三是技术理性赋能，助推社会积极健康发展。技术理性以科学逻辑与系统思维重塑社会运行模式，正成为推动社会快速、多元、包容增长的核心动能。在数智时代浪潮下，技术理性的价值早已突破工具范畴，演变为驱动社会全领域革新的深层力量，其赋能效应贯穿经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等各个层面，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活力。

在经济领域，技术理性构建起智能化生产新范式。AI与机器学习算法深度融入制造业，通过对生产设备运行数据的实时监测与分析，实现故障预测与预防性维护，大幅降低停机损耗。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分散的生产环节连接成智能网络，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产能，避免资源浪费与库存积压。同时，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供应链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融资渠道，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这种基于技术理性的生产变革，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率，还推动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公共服务领域，技术理性让社会资源分配更趋公平高效。在医疗健康行业，远程诊疗系统打破地域限制，5G网络支持下的高清视频会诊、实时生命体征监测，使偏远地区患者也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AI辅助诊断系统可在数秒内完成医学影像分析，帮助医生更精准地识别病灶，提高诊疗效率。在教育领域，在线教育平台依托云计算与大数据，构建个性化学习路径，根据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推送定制化课程，有效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智慧城市系统更是技术理性的集大成者，通过物联网传感器采集城市交通、能源、环境等数据，经智能算法分析后实现交通信号灯自适应调节、能源消耗动态管控，让城市运行更节能、更畅通、更宜居。在社会治理层面，技术理性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舆情监测系统，能实时抓取、分析网络舆论，帮助政府及时发现社会矛盾隐患，提前介入化解纠纷；电子政务平台整合跨部门数据，实现“一网通办”，简化办事流程，提升行政效能，增强政府公信力。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算法推荐，打破信息茧房，推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培育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同时，技术理性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互联网众筹平台借助数智技术聚合公众力量，为弱势群体提供及时援助；环保监测技术通过实时数据采集与公开，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此外，数字身份认证、电子合同签署等技术的普及，构建起安全可信的数智社会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

第四是文化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形成全新的数智文化。数智文明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保障。在数字技术与智能算法的浪潮席卷之下，文化与技术的交融已突破传统边界，催生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数智文化。这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既重塑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也为社会发展注入独特的价值内涵。

在艺术创作领域，数智技术为创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工具。AI绘画、影视及音乐生成算法打破了传统艺术创作的局限，艺术家可以借助机器学习模型生成灵感，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构建沉浸式艺术场景。如，数字敦煌项目利用3D建模与高分辨率扫描技术，将千年石窟壁画数字化，游客戴上VR设备即可“走进”洞窟，近距离欣赏壁画细节，感受历史与科技的奇妙碰撞。在文化传播方面，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借助大数据推荐算法，精准触达不同群体，使小众文化得以快速传播。汉服文化、非遗技艺通过短视频创作者的演绎，吸引大量年轻受众，推动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文化产业也因数智技术发生深刻变革。虚拟演唱会、数字藏品等新业态层出不穷。虚拟偶像依托动作捕捉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与粉丝的实时互动，开辟了娱乐产业新赛道；区块链技术为数字内容确权与交易提供保障，创作者可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作品版权的透明化管理与收益分成。这些

创新不仅拓展了文化产业的边界,更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此,数智文明的建设需要推动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人文关怀、人—机权利保障、虚实交互道德责任与行为规范的数智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以人、人—机、机器等生命为本,注重技术的人性化设计和应用,关注技术对人类社会、机器与环境的影响,引导人们正确地使用数智技术,实现技术与人—机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数智文明的社会变革与危机

数智文明是以高新技术叠加为基础,是科学技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结果。在数智文明的影响下,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首先,在社会结构方面,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的阶层壁垒与地域限制。以往由地缘、权力、血缘关系主导的社会结构逐渐被基于知识、技能、市场与数智资源掌控程度构建的新阶层所重塑。数智化平台的兴起,让个体得以跨越空间,便捷地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小众群体也能借助网络集结发声,社会多元化程度显著提升。传统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逐渐向多元化、散射状、网络化的结构转变。随着数智技术的普及,信息传播更加平等和快速,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这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同阶层的群体能更加平等地参与社会事务,且成本低。如自媒体的兴起让每个人有了发声的平台,能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其次,在生产方式上,数智文明引领了一场智能化、柔性化的生产革命。工业生产不再依赖大规模、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智能化生产设备与大数据深度融合,能依据客户个性化需求,精准调整生产参数与工艺流程。以汽车制造业为例,通过对客户订单数据的分析,生产线可自动切换生产不同配置、颜色的汽车,实现定制化生产,大幅缩短生产周期,降低库存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农业领域也不例外,借助传感器、无人机等数智技术,实现精准灌溉、施肥与害虫监测,以数据驱动农业生产,提升农产品产量与质量。

再次,商业模式在数智文明浪潮中也经历了颠覆性变革。电子商务平台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商业的交易模式,线上购物打破时空限制,让消费者能随时随地选购全球商品。直播带货等新兴营销模式,通过主播与消费者的实时互动,激发消费热情,创造了全新的消费场景。共享经济模式依托数智平台,整合闲置资源,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如共享单车、共享办公空间等,改变了传统的产权观念与消费习惯。企业营销也从传统的大规模广告投放转向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精准营销,依据消费者的浏览记录、购买偏好等数据,精准推送产品信息,提高营销效果与转化率。

最后,生活方式更因数智文明而发生了巨大变化。智能家居系统让人们在家中就能通过手机或语音指令控制家电设备、灯光照明、安全门锁等,实现家居生活的智能化、便捷化与个性化。出行方面,网约车、共享单车、智能交通系统等极大改善了出行体验,减少出行时间与成本。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取优质教育资源,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局限,实现终身学习。远程医疗借助视频通信、可穿戴医疗设备等技术,让偏远地区患者也能接受专家会诊,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数智技术与理念全方位融入生活,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高效智能且快捷廉价。

数智文明并非一蹴而就的,实为理性、科技和现实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蒸汽文明的动力革命、电气文明的能源革命到数字文明的数据革命,为数智文明提供原动力;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脑机接口技术等科技叠加以指数级创新速度突破文明发展的瓶颈,为数智文明提供技术支持;而处于革新之中的现代生活则成为数智文明的有利条件。这种加速度创新正以“技术—制度—文化”的协同演化路径,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效、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形态跃迁。此外,数智技术引发的观念、价值、行为、规范及生活世界变革带来的诸多新问题也促逼着数智文明的生

成、发展与成熟。

其一是引发新旧兼容难题，即前沿技术引发新旧观念、价值、行为和规范之间的冲突，逐渐凸显的伦理难题、道德风险及法律难题亟待解决。在数智时代的浪潮中，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社会各个领域，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从观念层面来看，数智技术的颠覆性特质与传统认知模式产生剧烈碰撞。AI深度学习模型具备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其输出结果有时难以用人类既有的逻辑思维进行解释，这种“黑箱效应”挑战了人类对决策过程透明性与可解释性的传统需求。人们习惯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明确认知，面对AI不可解释的决策，往往会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对技术发展产生抵触情绪。此外，虚拟现实与元宇宙构建的虚拟世界，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冲击着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基础，部分群体沉迷虚拟空间，导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传统的生活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受到动摇。

价值层面的冲突更为深刻。数智技术催生的“数据即资产”理念，与传统的公平、隐私价值观念产生矛盾。企业为追求商业利益，过度采集用户数据，利用算法进行精准画像与行为预测，侵犯个人隐私；大数据杀熟现象中，平台依据用户消费数据差异定价，破坏市场公平原则。在算法推荐领域，流量至上的价值理念导致低俗、虚假内容泛滥，冲击主流文化价值观，削弱社会正能量的传播。同时，自动化决策系统在招聘、信贷审批等场景的应用，可能因算法偏见加剧社会不平等，违背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

行为规范的不兼容在数智时代尤为突出。数智社交平台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得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失范行为屡禁不止，传统的道德约束在虚拟群落中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如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带来新的责任认定难题，当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事故时，责任归属究竟是制造商、程序员还是车主?现行法律和道德规范尚无明确界定。此外，区块链技术支持的加密货币交易，因缺乏统一监管，容易滋生洗钱、诈骗等违法行为，传统的金融监管与法律规范难以有效约束这些新型金融行为。

新生的伦理难题、道德风险及法律困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数智时代新旧兼容的巨大挑战。在伦理层面，基因编辑技术突破了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引发对人类进化方向和生命伦理的深刻担忧；AI创作的作品，其版权归属与伦理责任认定尚无定论。在道德层面，算法推荐引发的信息茧房效应，加剧群体对立和社会撕裂；虚拟世界中的身份造假、网络诈骗等行为，严重违背诚信道德准则。在法律层面，现有法律体系滞后于技术发展，面对数据跨境流动、元宇宙中的虚拟财产纠纷、AI生成内容的版权保护等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监管手段。

在现有的道德与法律制度中，这些问题都难以裁决，不仅是伦理难题，还是法律难题，对原有的观念价值、道德行为规范和法律制度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无疑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变革才能适应数智时代之需。

其二是产生系列的精神危机，自我认同危机、知识体系危机、认知危机以及意义世界坍缩，极易滑入数智虚无主义泥潭。从哲学层面审视，这些危机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人类主体性的解构，以及传统价值体系在数智洪流冲击下的崩解。

数智技术对主体性的消解，导致自我认同危机。从存在主义来看，“自我”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建构的动态过程。然而，数智时代的技术逻辑打破了这一建构的平衡性。社交媒体与虚拟世界赋予个体多重身份选择，这种身份的碎片化与随意切换，我有无数个“我”，我是“自我”，还是“非我”，或是“数智我”?无法确认。这已解构了传统意义上连贯、稳定的自我认知。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认为当代社会已进入“超真实”时代，拟像不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通过模型生成现实，导致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彻底消解[①]。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随时抛弃现实身份，化身截然不同的虚拟

①鲍德里亚著，车槿山译：《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0页。

角色,这种身份的可替换性使得“我”不再是基于真实存在的本质,而是沦为数智代码构建的符号集合。

更深刻的危机在于,算法推荐系统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为个体打造“定制化”的自我形象和数智自我形象。用户在算法构建的虚拟镜像中寻求认同,逐渐失去对自我的主动塑造权。正如福柯所言,权力通过规训技术渗透到个体的自我认知中成为“自我规训的主体”①,数智技术正以数据和算法为工具,将人类的自我认同纳入技术理性的控制体系,使主体在虚拟狂欢中逐渐丧失真实的自我意识。

真理确定性的崩塌,引发知识体系危机。在传统认识论中,知识被视为对客观世界的理性把握,具有确定性与权威性。然而,数智时代的信息爆炸与知识生产革命,彻底动摇了这一根基。海德格尔曾指出,技术的本质是“解蔽”与“遮蔽”的双重过程——在“座架”这种解蔽方式中,一切存在者都被摆置为持存物,这是一种解蔽,但同时也遮蔽了存在者的其他可能的显现方式,以及人自身的本真存在②;在数智技术推动知识快速传播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信息迷雾。AI生成内容的普及,使得知识的生产从人类理性思考转变为算法运算,知识的原创性、真实性和价值判断标准被颠覆。此外,解构主义强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但数智时代的知识碎片化走向了极端。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使人们陷入封闭的认知循环,知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被彻底打破。传统的知识验证体系在面对海量的数智信息时显得力不从心,知识的权威性不再源于理性论证,而是取决于流量与传播热度。这种知识体系的紊乱,导致人类在认知世界时失去了稳定的坐标,陷入对真理本质的迷茫与困惑。

理性思维的新异化,致使认知危机出现。康德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基于先天的理性范畴与经验的结合③,确立知识的基石。但在数智时代,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的认知模式,算法成为决定要素。算法推荐的同质化,在信息和流量的汪洋之中,人们的批判性思维与独立思考能力不断弱化、简化,被动接受图像、信息和视频,享受多巴胺带来的快乐。尤其是数智时代的商业化和娱乐化,“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④,娱乐不再是生活的调剂,而逐渐成为生活的重心。用户沉浸于短视频的即时刺激与虚拟世界的感官体验,逐渐丧失对复杂问题的深度思考能力。

更严峻的是,AI的强大算力与预测能力,使人类产生对技术决策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导致人类理性的“外包”,人类在认知过程中逐渐失去主体地位,沦为技术的“奴隶”。在数智时代,个体逐渐被技术所操控,不再是“主人”失去了自主性,陷入了物役性与异化的危机之中。不论工作,还是生活都愈加依赖技术,个体处于新的异化之中,“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⑤数字人、数字劳动、数字产品等都是新异化的形式与结果。这种过度依赖技术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人逐渐成为技术的附庸,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⑥,而数字数据产品转为商品,或消费品,就意味着不仅是“拜物教”,已过度至“拜数智教”,拜倒在数智商品与消费之中,逐步丧失主体性,成为数智品,远离自身,异化为非我,沦为算力的“宠物”。且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进一步模糊了感知与现实的界限,使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陷入“庄周梦蝶”般的不确定性,动摇了认知的根基。

①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80-181页。

②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演讲与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2页。

③康德著,李秋零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④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

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价值虚无主义蔓延，致使意义世界坍缩。尼采宣告“上帝已死”，揭示了传统价值体系的崩塌，而数智时代正在加速这一进程。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将一切价值纳入量化与效率的评价体系，人类的精神追求与情感体验被简化为数据指标。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职场中的绩效主义、教育领域的功利导向，使人们在追求数智目标的过程中，逐渐遗忘了生命的本真意义。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的存在需要“超越”来赋予意义，但数智时代的虚拟娱乐与信息洪流，使人们陷入无意义的消遣循环或沦为“多巴胺动物”。当人们无法在数智世界中找到真正的价值归属，虚无主义便成为精神困境的最终归宿。数智虚无主义不仅表现为对传统价值的否定，更体现为对一切意义的怀疑与拒斥，这种精神状态若持续蔓延，将对人类文明的根基构成根本性威胁。

数智时代的精神危机并非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在技术应用中忽视价值引导与人文关怀的代价。要摆脱数智虚无主义的困境，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以人文精神重塑技术发展方向，在数智洪流中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这不仅是对个体精神困境的救赎，更是关乎人类文明未来命运的关键抉择。

其三是产生新的数智治理困境，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到社会治理都遭遇前所未有的难题。这些难题源于数智技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冲击，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亟需系统性的应对策略。在全球治理中，正面临着数智边疆、信息安全与数智霸权的多重博弈。数智边疆建设成为新课题，网络空间、卫星轨道、数据资源等构成的“数智边疆”模糊了传统地理边界，国家间围绕数智主权、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展开激烈争夺。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通过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构建起数智壁垒；而美国凭借其在互联网技术领域的优势，试图推动数据自由流动，两种模式的冲突折射出数智边疆划分的矛盾。

信息安全威胁不断升级，网络攻击、数据泄露、关键基础设施被恶意操控等问题频发。如勒索病毒攻击可导致医院系统瘫痪、交通网络崩溃，直接威胁公共安全；国家间的网络间谍活动窃取核心技术与机密情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同时，数智资源竞争与贸易矛盾重重，芯片、云计算、AI算法等核心数智资源成为各国战略争夺焦点。半导体产业链中，芯片制造技术的高度集中使得部分国家在贸易谈判中掌握话语权，而其他国家则面临技术封锁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更严峻的是数智霸权的出现，少数科技强国凭借在操作系统、搜索引擎、社交平台等领域的垄断地位，主导全球数智规则的制定。美国科技巨头掌控着全球大部分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通过算法推荐影响舆论、干预选举，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破坏全球数智治理的公平性与民主性。

在国家治理层面，遭受着数智安全、算力与权利的平衡、政治数智化等难题的考验。如今，数智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智技术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带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脆弱性、公民数据隐私泄露等风险。政府政务系统若遭受黑客攻击，可能导致公民身份信息、政务机密泄露，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算法凭借技术与数据优势已成为组织、团体及个人决策的重要帮手，逐步从辅助地位升为主导地位，甚至是隐形决策者，成为一种新型权力即“算法权力”[①]。算力作为数智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更加显著，因此其与个体权利的平衡性常被打破，不时僭越，侵犯用户的权利；它不仅影响经济竞争力，更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拥有强大算力的地区或群体，在资源分配、政策制定中占据优势，可能加剧地区间、群体间的权利受损。

在政治数智化进程中，AI辅助决策、大数据舆情分析等技术广泛应用，但也存在算法偏见、数据失真等问题。选举过程中，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算法推送针对性内容，可能操纵选民意愿；政府决策过度依赖数据模型，若数据存在偏差或算法设计不合理，将导致政策失误，损害公共利益。此外，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法律滞后性之间的矛盾，使得国家治理在创新与监管之间难以找到平衡。

①张凌寒：《算法权力的兴起、异化及法律规制》，《法商研究》，2019年第4期。

在社会治理中,逐渐出现数智鸿沟、数智垄断等新问题。在全球不均衡发展的状况下,目前数智技术不仅没有抹平原有的社会鸿沟,反倒在各种因素的催化下,形成新的不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数智鸿沟”——不同地区、群体在数智技术获取与应用能力上的差距,“在社会中存在的数字技术和信息资源的不平等现象”[①]。在数智时代,数智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然而,数智鸿沟的存在却使得不同地区、群体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甚至进一步恶化为难以跨越的鸿沟。数智鸿沟在城乡、代际、不同收入群体间不断扩大,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薄弱、老年人数智技能缺乏,使其在数智经济、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难以享受到数智技术带来的便利,加剧社会不平等。同时,数智垄断企业凭借数据优势、网络效应形成市场壁垒,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大型互联网平台通过“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手段限制商户选择,滥用用户数据牟取超额利润,损害消费者权益与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数智技术还催生新型社会问题,如网络暴力、算法歧视、深度伪造等。社交平台上,匿名性使网络暴力屡禁不止;招聘、信贷审批等场景中,算法因训练数据偏差产生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深度伪造技术可制造虚假新闻、篡改视频,扰乱社会舆论秩序。这些问题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社会规范提出了严峻挑战。正是这些内外因与现实条件形成的良好合力致使数智文明萌芽,从自在走向自为,审视数智时代的难题,寻求科学的治理方法,构建系统的新知识体系,以回应现实之需。

三、数智时代的治理之道

当移动互联网与AI叠加时,数智文明就已开启,不论持何种立场与态度都无法改变这一大势,即新的时空观、主体、对象与境遇全部形成,一个新世界已经诞生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之中,且与人类共在。只有科学合理规范数智文明时代的多元主体的行为,从技术层面,建立规范化的标准与监管措施;及时创新与完善相应的制度,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推动教育改革,实现教育数智化,培养兼具数智能力的综合型人才,逐渐建立数智文明价值观,助益人机共处和谐共生[②]。针对数智时代的危机与挑战,破局思路主要有:

第一,在数智文明浪潮下,新旧兼容难题衍生的伦理、道德与法律困境,本质是人类文明范式转型中价值体系的撕裂与重构。面对这一挑战,需从哲学高度审视,构建系统性应对策略。

从本体论审视,前沿技术重塑了人类存在的根基。AI生成内容模糊了创作主体的边界,基因编辑技术挑战生命本质的定义,这些技术实践打破了传统认知中“人”与“物”、“自然”与“人工”的二元对立。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超越传统本质主义和二元论思维,以过程哲学的观点重新理解存在。怀特海提出“存在即过程”,将技术创新视为动态演化的过程,在技术发展与价值塑造的互动中,重新定义人类的主体性和价值坐标,避免因固守旧有观念而阻碍文明进步。

从认识论分析,新旧观念的冲突源于认知框架的代际差异。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现象不断冲击着传统认知体系,如算法推荐机制引发的信息茧房,动摇了理性主义所推崇的客观认知模式。应对此局面,需借鉴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思路,调整认知范式。一方面,要保持开放的认知态度,接纳技术带来的新认知维度;另一方面,通过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促进不同代际、不同领域人群之间的对话,在多元认知碰撞中构建新的共识,形成适应数智时代的认知框架。

从价值论剖析,伦理道德难题的根源在于价值排序的混乱。技术的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导致人文价值的萎缩,如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中,效率优先与生命至上的价值抉择陷入两难。对此,我

①狄波拉·勒普顿著,王明玉译:《数字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43页。

②万欣荣:《算法社会的数字文明向度》,《世界哲学》,2024年第5期。

们应回归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价值观，重新审视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技术不应只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而应服务于人类的“美好生活”这一终极价值。同时，引入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技术规则制定中遵循“无知之幕”原则，确保技术发展的公平性与普惠性，避免少数人垄断技术红利。

从实践论来看，应对法律难题需建立“动态平衡”的治理机制。海德格尔曾警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技术发展可能形成对人类的禁锢。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底线，不应滞后于技术，也不能过度限制创新。可借鉴德沃金“整全法”理论，将法律视为一个动态的、不断解释与发展的体系。通过建立“技术伦理委员会”等跨学科组织，将技术专家、伦理学家、法学家等纳入决策过程，实现技术创新与价值规范的同步演进；同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智能合约”等新型法律载体，使法律规则能更敏捷地适应技术变化。

数智文明中的新旧兼容难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阵痛。唯有从哲学高度反思，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才能在技术创新与价值守护之间找到平衡点，推动数智文明朝着更加和谐、健康的方向演进。

第二，数智技术引发的精神危机，本质上是人类在技术狂飙中遭遇的意义失落与自我迷失。要化解这场危机，需从哲学根基处入手，重构精神世界的坐标系，抵御数智虚无主义的侵蚀。

从现象学来看，自我认同危机源于数智技术对“具身性”存在的解构。在元宇宙中，用户通过虚拟化身穿梭于不同身份，社交媒体上精心构建的人设与现实自我形成割裂。胡塞尔强调“生活世界”的原初性，应对此危机，需重新锚定自我的具身性存在。通过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对世界的“烦忙”与“烦神”，在新的实践与人际交往中重塑自我感知。如，通过参与社区志愿活动、沉浸式艺术创作等具身化体验，重建身体与精神的统一性，让自我认同回归到具体的生活情境与生命体验之中。

知识体系危机的深层矛盾，在于技术加速带来的“确定性崩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知识的层级结构，知识更新速度远超人类认知消化能力。康德认为知识是“经验材料”与“先天形式”的结合，面对危机，我们需重建知识的“先验框架”。一方面，利用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启示，培养批判性思维，在信息洪流中辨别真伪；另一方面，借鉴怀特海“过程哲学”，将知识视为动态的生成过程，建立“开放—整合”的知识体系[①]。通过跨学科的“问题导向”学习，在解决问题中重构知识关联，让知识回归服务于实践与价值追求的本质。

认知危机本质上是技术理性对人类“感知—理解”机制的异化。算法推荐塑造的“信息茧房”削弱了人类主动认知的能力，虚拟现实技术模糊了真实与虚拟的边界。对此，可借鉴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强调身体知觉在认知中的奠基作用。通过“具身认知”实践，如户外运动、手工劳作等，唤醒被技术钝化的感官能力，恢复人类与世界的直接感知联结。同时，运用黑格尔“主客辩证法”，在与技术的互动中保持主体性，将算法、虚拟场景等视为认知的延伸与工具而非主宰，主动构建认知路径，避免陷入被动的“认知休眠”状态。

意义世界的坍缩与数智虚无主义的蔓延，折射出人类价值根基的动摇。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后，数智技术似乎成为新的“造神者”，但技术本身无法赋予生命终极意义。应对此困境，需回归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人注定自由，也注定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②]。通过萨特所言的“自我塑造”，在技术世界中主动创造价值。同时，借助东方智慧，消解技术崇拜，重建与宇宙、生命深层联结的精神维度，为意义世界注入新的活力。

若化解数智时代的精神危机，则需要人类以哲学的智慧重新审视自身与技术的关系。在具身实践中锚定自我，在动态建构中重塑知识，在主动认知中守护理性，在价值创造中重寻意义，方能

①怀特海著，李步楼译：《过程与实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页。

②萨特著，杜小真译：《存在与虚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12页。

在技术浪潮中坚守精神家园,避免坠入虚无主义的深渊。

第三,数智治理困境的破解,需要从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层面协同发力[①],通过机制创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导,构建适应数智时代的治理体系。

在全球治理层面,构建多边协同的数智治理框架,引导全球数智治理的方向,实现和谐共生共荣的治理目标。在全球数智治理领域,首先应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当前,国际社会可参考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协商机制,由联合国主导,联合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科技企业等多方力量,组建"全球数智治理联盟"。通过定期召开全球数智治理峰会,针对数智边疆界定、跨境数据流动、网络空间主权等关键问题,制定统一的国际标准和行为准则,避免各国规则差异过大引发治理混乱。

为应对数智霸权与资源竞争,需建立公平的全球数智资源分配机制。一方面,国际组织应推动算力资源的合理布局,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等合作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帮助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算力差距。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上,倡导"技术普惠"理念,鼓励各国共享开源技术成果,防止技术垄断加剧全球发展不平衡。此外,还可设立全球数智安全基金,用于支持网络安全技术研发和应对跨国网络攻击,提升全球数智安全的整体防护能力。

在国家治理层面,增强数智安全建设,建立算力与权利的平衡机制,消解各种危机与隐患。政府需建立动态的安全防护体系,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对能源、交通、金融等重要领域的数智系统进行定期安全评估和漏洞修复,同时建立国家级的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提高应对大规模网络攻击的能力;完善数智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据主权、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权责边界,例如出台《国家数据安全法实施细则》,细化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等制度。政府应合理引导算力资源的发展与应用,制定算力产业发展规划,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推动算力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发展,避免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建立算力使用的监督机制,防止算力被滥用或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在社会治理层面,通过多元共治多方协作弥合数智鸿沟与遏制数智垄断等社会问题。为解决数智鸿沟问题,社会各界应共同发力推进数智普惠。政府可实施"数智素养全民提升计划",通过社区教育、在线课程等多种形式,向老年人、偏远地区居民等群体普及数字技能知识;企业则可开发适老化、简易化的数智产品和服务,降低数智技术的使用门槛[②]。同时,加大对农村与偏远地区的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通过5G基站覆盖、光纤入户等工程,实现数智服务的全域均等化。

针对数智垄断问题,需加强反垄断监管与市场竞争。政府应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将算法共谋、数据垄断等新型垄断行为纳入监管范围,定期对数智领域的头部企业进行反垄断审查[③]。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收集、使用和共享行为进行严格规范,防止其利用数据优势排挤竞争对手。此外,鼓励中小企业在数智领域的创新发展,通过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政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大型企业的垄断格局,促进数智技术的多元化发展与应用。

四、结语

数智文明的浪潮奔涌而至,将人类文明推向前所未有的复杂奇点。当算力成为新的"自然力",

①王海东:《道、认同与善治:治理范式略论》,《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②周鑫:《机器功能主义与数智鸿沟:演化路径、生成逻与规制策略》,《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4年第6期。

③姚聪聪:《数字文明的多重面相与建构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3期。

当算法开始编织社会关系的底层代码，当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消弭为数智薄雾，这不仅是技术革命的量变积累，更是文明范式的质变跃迁。这种跃迁既带来“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兴奋，也裹挟着“文明何去何从”的深层焦虑——它迫使人类在技术理性的狂飙中，重新追问文明的本质、价值与终极方向。

从刀耕火种到硅基智能，人类文明的进化史本质是“认知边疆”的持续拓展。数智文明的革命性在于，它打破了工业文明以降“工具理性主导一切”的单向度逻辑，创造出“人—机共生”的文明新生态。5G与量子计算打破物理时空的桎梏，使“天涯共此时”成为现实，数智文明创造的“压缩时空”体验，正在培育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数智文明意识”。碳基生命、硅基生命、碳-硅混合生命的多元共存，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认知。脑机接口让人类意识与算法共生，元宇宙允许个体在虚拟空间重构身份，这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对“人是什么”的哲学重写。工业文明的效率至上主义，正被数智文明的“包容性增长”理念超越。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既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如“数智鸿沟”），也能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价值互联网”——让偏远地区的手工艺品直达全球市场，使科研数据在开放平台上驱动协同创新。这种“技术向善”的可能性，昭示着文明价值从“物的积累”向“人的解放”的回归。

数智文明的终极命题，是如何在技术创新与人性守护之间找到“第三道路”。这既不是对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技术乌托邦的盲目拥抱；既承认数智技术如同火与工具，已成为人类文明进化的新基质，又应像对待自然一样敬畏技术、善用技术，在开发算力的同时，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文明基因库”。数智文明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创造更强大的工具，而在于拓展人类文明的“可能性空间”——它让知识突破印刷术的边界，让情感跨越时空的阻隔，让创造力挣脱肉身的限制。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技术是文明的仆人，而非主人；数据是文明的血液，而非枷锁；算法是文明的工具，而非终极真理。数智文明的终极目的仍是助推生命之光的绽放，多元主体和谐共生共荣。

[责任编辑：傅　强]